

歐美新教差會高等教育與中韓兩國現代知識精英群體的建構

王立誠*

〈目次〉

- 一. 歐美新教差會高等教育在中韓的源起與規模
- 二. 中韓差會高校教育模式的演變
- 三. 差會高等教育在中韓的“雙重文化”形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基督教新教差會在中韓兩國先後開辦了若干高等學校。這些學校自成一體，將西方教育體制直接植入東亞社會，對於中韓現代知識精英群體的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試就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這類差會高校在中韓兩國的源起和規模、教育模式、與本國文化的關係等方面進行比較，探討這類學校在中韓各自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發展道路的異同，以深入理解東亞社會在其現代知識精英群體建構過程中與西方教育的互動關係。這一研究是在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的資助下完成的，特在此鳴謝。

一. 歐美新教差會高等教育在中韓的源起與規模

在中國，自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開辟傳教事業后，雖然辦學幾乎與傳教相伴而行，但早年的傳教士認為辦學只是附屬於傳教的“善事”，而且所辦學校大多與中國傳統私塾相似，只是盡可能以《聖經》教義來取代儒家經典，甚少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授，因為經驗表明，“僅被教過西方科學的人比異教徒更難以接受福音的感召。”¹⁾

* 復旦大學 歷史系 教授

1) A. H.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但是，面對中國傳統儒家社會對基督教的敵視，不少傳教士發現，相比於收效甚微的巡行布道，辦學是吸納忠實信徒的更有效手段。美國北長老會的狄考文(Carvin W. Mateer)1864年底達山東登州後便開辦一所後來名為登州文會館的義塾，規定學生“要一氣學完六年的課程，才准其回家結婚就業”。²⁾ 以這種方法，他培養出一批教會的骨幹。

在1877年新教在華傳教大會上，傳教士們終於就辦學問題取得初步共識。狄考文的觀點使不少差會改變了對辦學的消極態度。他指出：“在中國，教育極受人們所推崇，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社會上所能起的影響極其有限。”傳教士應當利用他們的科舉知識優勢，通過教育建構一個基督教的知識群體，取代傳統士紳在社會中的精英地位，“而後者正是用異教來束縛民衆思想的主要力量”。³⁾

差會高等教育因此初露端倪。1877年，狄考文的登州文會館將英文名改為Tengchow College，成為在華差會教育進入“學院”時代的標志。⁴⁾ 但該校真正的“學院”課程則是在1882年開設。⁵⁾ 隨後，京師匯文書院於1888年，潞河書院於1889年，南京匯文書院於1911年，以及上海聖約翰書院於1993年，陸續開辦了學院課程。至1895年時據統計已有16所差會學校被冠以college之名，京師和南京匯文書院甚至被冠以university稱號。⁶⁾ 但是在傳統的科舉制下，這些洋學堂培養的學生還只是被打入另冊的“士”，社會地位遠不如科舉正途之士。

進入20世紀後，隨着清政府於1904年推行以日本為範本的新學制，並於翌年廢除了科舉制，一套最初的現代知識精英培養模式開始顯現。這使得傳教士感到迫切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因為“通過強化和完善這一服務力量，我們便增加了未來的中國政府教育製度受這一更佳榜樣的影響和以之為範本的可能性。”⁷⁾ 高等教育於是成為辦學重

1946, p.232.

- 2) 《王神蔭記齊魯大學校史》，朱有獻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輯，p.472。
- 3) 狄考文，《基督教會與教育》，《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4輯，pp.90-91。
- 4) 史靜賢，《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的教育活動》，(台灣：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pp.56-57。
- 5) F. L. Hawks Pott, *The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to the Life of China*,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Bulletin(以下簡稱CCEA Bulletin), No. 3 (1924).
- 6) J. Fryer,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1st Issue*,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85.
- 7) *An Appeal to Foreign Mission Boards for Trained Educators for China*, The Chinese

点，早先的簡陋學院逐漸走向正規，并且各差會開始聯合辦學，因為“建立弱小差勁的學校和學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要辦高質量的學校，“唯一的出路是合作”。⁸⁾ 聖約翰書院於1905年命名為大學，率先開設了歐美文科學院的四年製學士學位課程，並於1907年首次授予4名畢業生文學士學位。⁹⁾ 廣州嶺南學堂於1909年開辦大學部，但到1918年才有第一批大學畢業生。¹⁰⁾ 一批新的差會大學如蘇州的東吳大學(1901年)、濟南的齊魯大學(1904年)、北京的華北協和大學(1904年)、南京的金陵大學(1910年)由原上海中西書院、登州文會館、潞河書院、南京匯文書院與其他學校合併而成。此外還有差會聯合開辦的大學，如上海的滬江大學(1906年)、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1910年)等。¹¹⁾

女子高等教育也同時悄然興起。1904年，在北京貝滿學堂基礎上成立華北協和女子學院，開了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進入民國後，隨着社會風氣的轉變，滬江、嶺南、東吳和雅禮大學自1920年起實行男女同校，華北協和女子學院也併入了燕京大學，女子於是可以得到與男子一樣的高等教育。同上，第127頁。到1920年代末，差會高校普遍實行了男女同校，同時又保留了1915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學院和1917年開辦高等教育的福州華南女子學院作為專門的女子高校，此外還有兩所女子醫學院—廣州夏葛醫學院和上海女子醫學院。

歐美差會在高等教育上的巨大投入，使差會高校在清末教育體系中居領先地位，但民國成立後，形勢便逐漸逆轉。儘管中國政局動蕩，但隨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中國的新式教育便逐漸在社會中扎下根來。北京、北洋、東南大學等一批國立大學迅速崛起，使得差會高校的領先地位逐漸喪失，傳教士在1920年時已不得不承認，“我們發現自己已處在被中國教育系統領導而不是給予這種領導的地位。”¹²⁾ 而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立大學的規模進一步擴展，占据了中國現代知識精英培養的主導地位，差

Recorder(以下簡稱CR), Dec. 1902.

8) Records,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pp.70-71.

9) *Commencement Exercises*, St. Johns College, CR, Mar. 1907.

10) 李蔚明,《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版,p.37、51.

11) 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pp.506-509.

12) F. L. Hawks Pott, *Present Educational Tendencies in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以下簡稱ER), Apr. 1920.

會高校於是只能作為這一培養體製的補充模式而繼續存在。

在這種背景下，差會高校的總體發展趨勢是進行減少學校數量、提高質量的整合。一方面是重點辦高水平大學，其中最重要的動作是於1916年決定將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大學和華北協和神學院合併成立燕京大學，使之成為符合歐美標準的一流大學。

另一方面是辦高水平的專業教育，尤其在醫科方面。歐美差會在華醫療事業始於美國傳教士巴駕(Peter Parker)1838年在廣州開辦的眼科醫院。他的繼任者嘉約翰(J. G. Kerr)在醫院裏開辟了最早的醫學教育。到1915年時，中國有醫校29個，其中16個是差會事業。¹³⁾然而早期的醫校都是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小學校，每年都有夭折的危險，如果其中一位教師垮了的話。”¹⁴⁾為了提高教育質量，進入20世紀後，許多醫校并入新成立的大學，成為其醫學院，以便綜合利用資源。東吳、華北協和、齊魯和金陵大學成立後便都併入了當地的醫校；Soochow University, CR, Dec. 1905; D. Z. Sheffield, Co-ordination in Christian Education, CR, Jun. 1908; H. Balme, 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Tsinanfu.¹⁵⁾廣州的差會醫校也於1914年與嶺南大學達成協作協議。¹⁶⁾還有一種途徑是與美國的高等學府合作。聖約翰大學1914年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達成合作協議，其醫學院因此改名為“賓夕法尼亞醫學院”。¹⁷⁾美國耶魯大學的傳道團於1914年與湖南育群學會達成協議，開辦了湘雅醫學院。¹⁸⁾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15年成立中國醫社(The China Medical Board)，為辦真正一流的醫科教育提供了契機。醫社將并入華北協和大學的倫敦會醫校接手過來，成立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在建築和設備上投下巨資，使之成為歐美在華醫科教育的典範。同時，它為醫科教育確立了嚴格的標準，規定學生入學條件是中學畢業加上兩年醫學預科教育，學生必須學習4年，再加1年實習，方能拿到學位。¹⁹⁾它宣布任何醫學院要

13) *Editorial*, CR, Nov. 1915.

14) T. Gillison, *Medical Education: — A Revolution Necessary in Medical Mission Policy*, CR, Oct. 1913.

15) N. W. Brown, *Medical Education in Nanking*, CR, Nov. 1915.

16) A. H. Woods, *Union Medical Work in Canton*, CR, Nov. 1915.

17) J. C. McCracken, *Medical Education in Shanghai*, CR, Nov. 1915.

18) W. Reeves, Jr.,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Medicine: The Origins of Hsiang-ya (1902-1914)*,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29-175.

想獲得它的資助，就必須符合這一標準，這就推動了醫科教育的進一步整合。東吳、金陵、嶺南大學先後停辦了醫學院。到1930年代，除北京協和和湘雅外，僅齊魯、聖約翰和華西三校設醫學院，獨立差會醫學院只有瀋陽的東北醫學院和兩所女子醫學院。

第三方面是調整差會高校的地理區位分布。1922年，由美國著名教育家博爾敦率領的中國基督教教育考察團提出報告，主張在華東、華南、華西、華北、華中和福建各設一所大學，以實現地理區位的合理分布。但是，只有兩湖的文華、雅禮大學等到1929年時合并成立了華中大學，其它地區的整合却沒有成功。尤其在差會高校最多的江南地區，雖然1928年出台一個將這些學校合并為“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的計劃，但計劃最終因各校對此冷淡而流產。²⁰⁾

於是，到1930年代，歐美新教在華差會高校除獨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外，共有綜合性大學9所，文理學院4所，醫學院3所，神學院6所。據1936年的統計，各校的學生規模分別為：金陵大學890人，燕京大學869人，滬江大學590人，聖約翰大學570人，東吳大學567人，齊魯大學535人，嶺南大學515人，華西協和大學347人，華中大學162人，之江文理學院440人，福建協和文理學院163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238人，華南女子文理學院99人，夏葛醫學院56人，上海女子醫學院22人，齊魯神學院19人，信義神學院39人，金陵神學院56人，滬江神學院5人，廣東協和神學院24人，燕京宗教學院16人。²¹⁾東北醫學院據1934年的統計為學生107人。²²⁾此時差會高校的學生數約占全國高校學生總數的11%強，由此反映了中國現代知識精英群體建構中這一教育形態所占的份額。據統計，當時差會高校教員915人，占全國高校教員13%弱，職員658人，占全國總數的12%強，而差會高校校產和設施的總值則約占全國總值的18%，這表明差會高校在師資和設備上處於高於平均水平的較優越地位，從中也可見它們在高級精英培養上有較大的影響力。²³⁾

19) R. W. Merrin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CR, Nov. 1915.

20) *Correlated Program of Christian Colleges*, CR, Jul. 1929.

21) *CCEA Bulletin*, No. 38, (1936), pp.2-3.

22) 參見 *CCEA Bulletin*, No. 33, (1934), p.4.

23) 譚天凱,《基督教大學在吾國高等教育中之地位》,《教育季刊》,1938年,第4期。

當歐美新教傳教士於1884年在韓國開辟傳教事業的時候，韓國正處於向西方國家開放後邁向“開化”之途的轉折關頭。歐美傳教士因此被作為西學的傳播者而受到禮遇。第一位在韓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安連醫生(Dr. H. G. Allen)，因治愈在甲申政變中受重傷的大臣閔泳翊而深受李朝高宗器重，不但任命他為御醫，還為他出資開設一所西醫院，賜名“廣惠院”。傳教士的辦學活動也受到李朝的鼓勵。美國美以美會的瑪麗·施蘭敦夫人(Mrs. Mary F. Scranton)於1886年在漢城的家中開辦了韓國第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明成皇后翌年賜其名為“梨花學堂”。24) 安連1886年在醫院裏辦了一個醫藥班，但這一嘗試在他1890年離開醫院後便無形停頓。25) 傳教士甚至與官方達成某種人才培養的合作。美以美會傳教士亞扁薛羅(H. G. Appenzeller)1885年來韓時想辦一所教授英語的學校，高宗深表贊許，賜學校名為“培材”。這所學校於1886年在漢城開學後，作為對學校的承認，李朝政府授予其優秀學生官職。26)

因此，儘管同為儒家社會，傳教士在韓國最初的辦學活動在官方支持下比在中國遠為順利，但是和在中國一樣，他們內部也發生了辦學與傳福音之間的矛盾。由於吸取在華傳教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借鑒了倪維斯傳教法(Nevius method)，歐美傳教士在韓傳教時，自始就較注意發展本色化教會，強調與韓國民眾直接溝通，從而較迅速地打開局面，於是“傳教士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當地的福音工作上，很少注意當時開辦的少數學校”。27) 即使在培養神職人員上，他們也從發展自存自養的本土教會的意圖出發，反對提供高層次的教育。28) 於是，盡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在民族危機下改革教育的意識空前加強，繼1894年廢除科舉製後，高宗於1895年頒“教育立國”詔書，出台了韓國最初的近代學製，但傳教士却沒有表現在華同行那種要主導現代知識精英群體建構的明顯意識。培材學堂是當時最高水平的差會學堂。校方於1895年與政府簽訂合同，規定政府每年送至多200名學生來校

24) 梨花七十年史編纂委員會：《梨花七十年史》，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p.504。

25) L. George Par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1832-1910*, Pyeng Yang: Unio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 1929, pp.120-121.

26) Ibid. pp.128-129.

27) W. M. Baird,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Work, Quarto Centennial Papers Read Before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909, pp.60-61.

28) W. D. Reynolds, *The Native Ministry*, The Korean Repository, May 1896, pp.200-201.

學習。但是，學校不斷增加宗教課程、減少英語課程的做法導致學生的不滿。1902年亞扁薛羅去世後，合同便終止了。²⁹⁾

在韓差會高等教育於是最初只是靠傳教士的個人努力。1893年來韓接辦廣惠院的北長老會傳教士魚丕信(O. R. Avison)將醫院改由差會自辦後，1900年秋從美國克裏夫蘭的世富蘭德先生(Mr. Louis H. Severance)處獲得一筆捐款，於1904年在漢城建成韓國第一所現代醫院，以其捐獻人的姓氏命名為世富蘭德醫院。同時，魚丕信把醫院中韓國助手培養成現代醫生的工作也演變為醫科教育。1908年6月，這所世富蘭德醫院醫學院(Severance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畢業了首批7名學生。³⁰⁾按：這批畢業生中有人早在1901年便註冊為醫院的學生，可見這所醫校可被視為韓國差會高等教育的開端，儘管它的首批畢業生比崇實學堂略晚。³¹⁾

隨著教會本色化的順利推行，在韓傳教士越來越脫身出教會的具體事務，他們便有較多時間和精力來辦學，效法在華同行，“更好地組織起來，將傳教士的工作重點放到訓練教會和學校的領袖上”。³²⁾北長老會的裴緯良(W. M. Baird)1898年在平壤開辦的崇實學堂於是成為第一所在韓開辦普通高等教育的差會學校。1906年，與美以美會傳教士合作，崇實開辦了四年製大學科，學校的英文名因此改為“Pyeng Yang Union Christian College and Academy(平壤基督教協合學院和中學)”。³³⁾1908年5月崇實畢業了首批2名學生。³⁴⁾培材學堂也於1910年籌辦大學科。³⁵⁾女子高等教育也同時提上日程，開創韓國女子近代教育的梨花學堂於1910年開辦了大學科。³⁶⁾此舉使得在韓差會在這一領域與在華差會基本同步。

日本於1910年吞并韓國後，其朝鮮總督府推行一套旨在控制韓人智識的學製。在高等教育方面，它在接手原來韓國官辦學校的基礎上，先後開辦了京城法學、京城醫學、京城高等工業、京城高等商業和水原高等農林共5所“官立”專門學校，全部

29) L. George Park, op. cit., pp.230-241, p.309.

30) Severance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Graduating Exercises, The Korean Mission Field (以下簡稱KMF), Jul. 1908.

31) 參見：Kim Kiu Sik, *Dr. Kim Pil Soon*, KMF, Jan. 1911.

32) *Editorial*, KMF, Nov. 1908.

33) W. M. Baird, *Pyeng Yang College and Academy*, KMF, Nov. 1907.

34) *Editorial*, KMF, May 1908.

35) L. George Park, op. cit., pp.398-399.

36) 《梨花七十年史》，p.504.

用日語和日本方式教學。1924年又成立京城帝國大學，分設3年預科和4年本科，作為韓國的最高學府。³⁷⁾ 然而，這些官立高校的曆年學生中，只有京城法專是韓國學生居多，以培養協助當局統治韓人的官僚，其餘高校都是日本學生為韓國學生的二至三倍以上。例如1936年的日韓學生比例，京城法專為54：149名；京城醫專為250：78名；京城工專為141：64名；京城商專為230：61名；水原農專為156：57名；京城帝大預科為288：160名；京城帝大本科為372：170名。³⁸⁾ 此外，日占當局在韓不設高等師範學校，把高級師資的培養放在日本本土。這一切足以表明日本通過控制知識精英群體來操縱韓國的社會經濟，使之殖民地化的險惡用心。

於是，着眼於培養韓人的差會學校成爲一種當局未能完全控制的獨立因素，歐美傳教士作爲“據信存在於他所來自的烏托邦國家的理想狀態的體現”，不願坐視韓人僅從日本接受轉手的西方文明，差會學校便與“官立”學校形成某種競爭關係。³⁹⁾ 各差會因此注重辦正規的高等教育。北長老會傳教士元杜尤(H. G. Underwood)積極主張在韓國政治經濟中心漢城辦一所有影響力的大學。此建議得到美以美會的支持，並在1912年通過決議，要辦一所“組織健全、人員精良、設備完善”的大學，認爲“這樣一所大學必將得到政府的尊敬、韓人的擁護和教會的支持”。⁴⁰⁾ 在雙方合作下，“朝鮮基督教學院(Chosen Christian College)”於1915年3月5日在漢城成立，其韓文校名隨後定爲“延禧”。而培材在延禧成立後不再辦大學，這樣使延禧作爲差會聯合事業，通過集中多個差會的資源而成爲韓國最大的差會高等學府。⁴¹⁾ 崇實學堂則因美以美會自延禧開辦後退出崇實，成爲由四個長老會(美國南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長老會)合辦的學校。學校長期規模較小，直到1926年建成科學樓後，規模才漸次擴充。⁴²⁾

世富蘭德醫學院於1912年建成自己的醫學院樓，改變了從屬醫院的地位。Severance Hospital, Seoul, KMF, Sept. 1912. 由於在韓傳教醫學會1909年決

37) Compiled by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Annual Report on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1934-35, Keijo,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Dec. 1935, pp. 86-87.

38) 朝鮮總督府編纂，《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昭和11年，朝鮮總督府昭和13年刊行，pp.315-318。

39) H. H. Underwood, *The Educational Status of the Korean Peopl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 Korea and Formosa*, 1920, p.285.

40)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Action Concerning Union College Work*, KMF, Aug. 1912.

41) O. R. Avison, *Chosen Christian College*, KMF, Dec. 1921.

42) *The Korea Missions Year Book*, 1928, Seoul,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Korea*, pp.208-209.

議，在韓國只辦一所聯合醫學院，A Christian Korean Celebration, KMF, Dec. 1909. 1911年後其它差會加入合作，學院於1917年改名世富蘭德聯合醫學院(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學院的教育水平因此迅速提高，并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協作關係。⁴³⁾學生的入學條件也不僅必須中學畢業，而且有不少是從其它高校轉入，例如1921年的20名新生中，有6人來自延禧，1人來自崇實。⁴⁴⁾這樣，一套正規的醫科教育體制終於形成。校長魚丕信在1916至1934年間兼任了延禧學院校長，促進了兩校的合作和資源共享，并為未來最終合并為如今的延世大學埋下了伏筆。Extracts from Report of 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Nurses Training School, KMF, Jul. 1922.

梨花學堂於1914年畢業了首批3名大學科學生。⁴⁵⁾由於日占當局在韓國不辦女子高等教育，更談不上推行男女同校，因此梨花成為二次大戰爆發前韓國唯一培養女性知識精英的高等學府。

到1936年，這四所差會高校的學生規模分別為：延禧443人，崇實145人，世富蘭德180人，梨花235人。⁴⁶⁾

此外，在神職人員的培養上，1902年由馬布三悅(S. A. Maffett)在平壤開辦的“長老會神學校”，和監理宗的美以美會和南監理會於1910年辦的監理宗“漢城協成神學校”，到1920年代也都達到相當於高校的程度。監理宗神學院1925年的學生數為165人，長老會神學院的約150人，不僅規模都遠超過中國當時的任何神學院，而且長老會神學院“據稱是世界上最人的長老會神學院”。⁴⁷⁾

因此，若將在韓差會高校與在華差會高校作比較，在從事世俗教育的高校中，延禧接近於在華差會中等大學的規模，崇實相當於小型學院，韓國還沒有像燕京、金陵那樣的大型差會大學。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梨花與代表在華差會女子高校水平的金陵女子

43) *The Korea Missions Year Book*, 1928, pp.212-213.

44) E. W. Koons, *Educational Work of Seoul Station*, KMF, Aug. 1921.

45) A. R. Appenzeller, *Ewha Haktang, Womans College of Korea*, KMF, May 1922.

46) 《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昭和11年，pp.316-317.

47) J. E. Fisher, *Democracy and Mission Education in Korea*, New York: J. J. Little & Ives Company, 1928, p.4.

文理學院規模相似。在男女生比例上，據1936年統計的在華差會高校女生數為1660人，約占差會高校學生總數的25%，⁴⁸⁾ 同年梨花的學生數占總數的23%，兩者相當接近。世富蘭德醫學院雖然程度稍低，但學生規模却超過任何一所在華差會醫學院。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華差會高校學生數僅占中國高校學生總數的11%，其較側重於高級人才的培養；而在韓差會高校雖然在日占當局的學製中僅為“專門學校”，低於日製的大學，但這四所差會高校的學生數却大為超過“官立”高校的韓國學生數，到1936年時前者為1003人，後者僅739人，這表明在韓國現代知識精英群體的建構中，差會高校的影響力超過當局的“官立”高校，更不用說在女子方面。而當年高校韓國學生總數為2834人。⁴⁹⁾ 四所差會高校約占其中35%，這比例也遠高於在華差會高校所占的比例。

二. 中韓差會高校教育模式的演變

在中國，當20世紀初歐美差會開始推行正規的高等教育時，其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仿效美國的文科學院，進行通識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上海聖約翰大學是這種教育模式的典範，所修科目包括宗教、英文、歷史、格致、數學、哲學、經濟及教學法等文理各科，課程大多是必修課，甚少選修課。⁵⁰⁾ 這種課程設置的原因除了由於草創時期師資有限外，更重要的是基於歐美傳統“學院”的理念：“學院不是一所專科學校。對它課程設置的檢驗，自始至終是它在文化價值上教育成效的檢驗”，學院因此不提供“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一所學院只有給予它的學生和研究生一種廣博和高雅的文化，同時使他們走向某個有價值的確切領域的道路，并在其中作出有用的服務時，才是一所真正的學院。”⁵¹⁾ 在美國這個沒有世襲貴族的新世界，引進歐洲傳統“自由教育”所造就的“文學士”構成美國的“某種教育貴族”，⁵²⁾ 而傳教士在華辦高等教

48) *CCEA Bulletin*, No. 38, 1936, pp.3-4.

49) 《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昭和11年，pp.315-318.

50) N. G. Gee,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3rd Issue, 1905, pp.14-15.

51) L. Miner, *The Aims to be Sought in the Christian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ER, Jan. 1919.

育，其目標也正是要按照一套基督教的規範來建構一個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

然而，民國成立後，傳教士一方面受到社會福音論和美國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注意到在從講究身份的農業社會向講究實效的工商業社會轉型的中國，“如果我們不能以一種高效率來訓練學生從事某種實際工作，我們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流民’，無論對教會還是社會都有害無益，53) 便日益轉向教育作為培養現代公民手段的‘社會化’和學以致用的‘職業化’。54)

在推行專業教育方面，1914年，金陵大學開辦了一個半工半讀的農科；1915年東吳大學在上海開辦了比較法學院，也是半工半讀性質，從而開創了差會高校辦應用性專科教育的先例。55) 更重要的是，一些學校開始改造原來的文科學院模式。1916年，滬江大學首先推行了“選科製”(group system)。這種製度實際上是美國綜合性大學在最終採用“主修製”(major subject system)專業教育前的一種折衷性製度，“學生可以在一系列的課程組合中進行選擇，每個課程組合具有某種強制的內在一致性”，因而有助於專業化。56) 滬江大學規定學生自三年級起在新設的文、理、社會科學、宗教四科中“選擇一科并按其要求修完有關課程”。校章宣布：“選科應根據興趣和能力，尤其是根據人們將來所從事的終身事業。”57) 這就是說，學生將來所從事的職業，成為學校科目設置的導向，因此在教育模式上，它具有從原來經院式的自由教育轉變為以發展個性和適應社會需要為方向的專業教育的意義。

其他差會大學也迅速採納了這種選科製，按各自的條件設置各科。就連一向強調自由教育的聖約翰大學，也於1919年實行選科製。校長卜舫濟(F. L. Hawks Pott)盡管宣稱，“我們最好不要被職業教育的鼓噪過於激動”，但承認，“在我看來，大可在大學二年後開始專業化。雖然學生應當對獲取知識本身感興趣，但同時，人的本性是，如果他意識到這些知識對於為他將某一專業作準備有實際的價值，他的興

52) L.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6.

53) F. C. Mabee, *Conserving the Results of Mission Educational Work*, CR, Jan. 1916.

54) F. L. Hawks Pott, *War and Education*, ER, Jul. 1919.

55) 金陵大學校友會，《金陵大學建一百周年紀念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p.57,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BCCC, 1955, pp.70-72.

56) L.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86.

57) *Catalogue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 1916, pp.15-17.

趣肯定會增加。”⁵⁸⁾

在推行專業教育的同時，差會高校在學生訓育上，由原來單純的基督教教義灌輸向培養一種社會服務精神轉化。在杜威的“學校即社會”和主張基督教社會改良責任的社會福音論的影響下，傳教士開始強調通過社會服務來陶冶學生的人格，培養現代公民。滬江大學同樣成爲這方面的典型學校。它於1917年在上海最大的工業區楊樹浦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學生社會實驗基地“滬東公社”。在那裏，學生在傳教士指導下不僅辦聖經班，而且從事改善勞工生活福利，開展平民教育等社會服務，嘗試按基督教精神和現代公民標準建立“一個朝向自我實現的社區”。⁵⁹⁾

事實上，這種引導學生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主要由基督教青年會來承擔。北京青年會幹事步濟時(J. S. Burgess)1912年發起成立一個“北京社會實情會(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有13所院校200多名學生參加，爲下層民衆開辦平民夜校、運動場和組織各種科學和生活知識的宣講。⁶⁰⁾ 這樣的活動範圍擴展到天津、上海等其它城市的青年會。⁶¹⁾ 到了1920年代初，青年會總干事餘日章進一步提出“人格救國”，在這個口號下青年會組織了公民教育運動，這樣，基督教的宣教逐漸與自由民主精神的培養融爲一體。⁶²⁾

1922年的基督教教育考察團報告肯定了這種教育的“社會化”和“職業化”。報告似乎沿用了早年狄考文的觀點，即要使中國成爲一個基督教國家，就要發展一個基督教的知識精英群體，但是在知識精英的內涵上，報告修改了早先等級意識下的自由教育思想，強調了教育的社會“效能”，即要以培養具有專業知識、自立自尊、服務社會的現代公民爲方向。⁶³⁾

由於中國學界在新文化運動中同樣受杜威思想的影響，在1922年的新學製中引進了美國學製，⁶⁴⁾ 因此在教育模式上，差會高校與中國自辦高校出現某種趨同。到

58) F. L. Hawks Pott, *War and Education*, ER, Jul. 1919.

59) D. H. Kulp, *Social Effort in Yangtzepoo*, Shanghai,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8, p.346.

60) J. S. Burgess, *Peking as a Field for Social Service*, CR, Apr. 1914.

61) H. Cressy, *Social Service in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5, pp.322-326.

62) 劉湛恩,《五年來之公民教育運動》,《青年進步》,第100冊(1927年2月)。

63) 中國基督教教育調查會,《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pp.318-319.

64)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龍門書店1969年影印版,pp.102-103.

1920年代末，雙方的學製差異隨着差會高校紛紛向政府立案便最終消除。而國民政府所確立的學製採用了美國的“主修製”，規定大學下設各學院，其下設各學係，學生自第二年起進入各自的主修係學習。⁶⁵⁾ 因此，“主修製”的推行使差會高校和國立高校一樣，全面實現了專業化。據1936年的統計，除醫學院和神學院外，差會高校有文學院10所，理學院9所，文理學院3所，公共事務和法學院各1所，教育學院1所，商學院3所，農學院2所和鄉村領袖訓練學校1所，工學院2所。⁶⁶⁾

然而，差會高校并不因此放棄自身的特色，而是在主張“自由試驗”下，走與國立大學有所不同的道路。例如，國民政府於1930年代初推行一項增強理、工、農、醫等“實科”，限製文、法、商、教育、藝術等“文科”的政策，但不少差會高校仍堅持發展與基督教教會密切相關的“文科”專業。⁶⁷⁾ 一些差會高校還大舉擴張了半工半讀的職業補習教育，如東吳和滬江大學在上海辦的法學院、城中區商學院等。這些學校由於得到當地社會的支持與合作，規模迅速擴大，政府雖然企圖限製也最終無可奈何。⁶⁸⁾

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對學生社會服務精神的培養。不僅滬東公社這類城市社會服務得到進一步發展，燕京、齊魯、福建協和等校還開辟了農村社會服務基地，就連一向以培養最高級醫學人才為目標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也在1930年代派學生參與晏陽初在河北定縣辦的農村改革試驗，培養“赤腳醫生”。⁶⁹⁾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強調：“燕京教育目的，并非專備課室、圖書館為學生讀書……同時也不是為培養甚麼人材從事某種政治經濟活動。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⁷⁰⁾

於是，在華差會高校的教育特征，是通過以基督化精神服務社會的專業教育，建構一個現代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與傳統“學而優者仕”的士大夫不同，其學生“對於職業之選擇，多從工商、醫藥、法律、學術、銀行、教育、宗教及其他社會上的自由職

65)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大全》，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pp.884-887。

66) *CCEA Bulletin*, No. 38, 1936, pp.2-3.

67) 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pp.96-98。

68) 曉峯，《論教育部與上海法商大學教育》，《中華辭報》，1934年2月21日。

69) M.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233-240.

70) 《燕京新聞》，1934年12月18日，轉引自陳時偉，《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章開沅等主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174。

業”。71) 這種新型的知識精英群體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部分，適應了中國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的需要。

在韓國，差會高校的教育模式也經歷了從自由教育向社會化專業教育的轉變。崇實學堂最初的辦學，“其目標是效法美國中西部的小型教派學堂”。學堂只招收基督徒學生，并把課程限定在文科，提供西式的自由教育，希望學生將來“成為牧師的候選人”。72)

延禧學院的誕生體現了傳教士們意識到高等教育適應韓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與崇實不同，延禧開辦之初就計劃推行專業教育，最初的學製是開設文學、神學、數學及物理、商、農、應用化學共6科。73) 但到1921年，其分科便確定為文、理、商三科。74) 而崇實也在1920年代發展專業教育，“加入一門商科”，并允許非基督徒學生入學。75) 1931年的《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記載它在那年除文科外增加了一個當局承認的“數理科”。76) 梨花自開辦大學科後設文科和音樂科兩科，1915年起增設一個兩年製保育科，培養幼稚園教師。77) 1929年春，梨花又增設一個家事科，校方宣稱：“雖然課程是按照高學術水準來規劃并保持在這樣的水準上，但整個重點是實用的而非學究式的。”78)

由於要取得日占當局的承認，延禧於1917年、世富蘭德於1922年、梨花和崇實於1925年先後向當局注冊，成為其學製中的“專門學校”。79) 這樣，與在華差會高校立案後仍保持美式教育體製不同，在韓差會高校此後不得不從屬於日本式的教育體製，尤其在課程設置上，必須符合日本學製那種“軍團化教育”的剛性結構。以最有代表性的延禧三科為例，其文理科的學製為四年，商科為三年，所設課程大多為必修課，甚少選修課。由於日式中學學製僅五年，比中美的中學少一年，因此文理兩科必須保持大量基

71)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中國近代學製史料》，第4輯，p.555。

72) H. H. Underwood, *Modern Education in Kore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26, p.127.

73) *Ibid.*, p.141.

74) E. W. Koons, *Educational Work of Seoul Station*, KMF, Aug. 1921.

75) H. H. Underwood, *op. cit.*, p.127.

76) 《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昭和6年，朝鮮總督府昭和8年刊印，p.668。

77) 《梨花七十年史》，pp.94-95。

78) Hamna Kim, *The Need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in Korea*, KMF, Oct. 1929.

79) 朝鮮總督府學務局宗教課，《昭和二年十二月末調，朝鮮宗教及享祀一覽》，漢城：大和商會印刷所昭和四年印，pp.60。

礎課，不能開設較深的研究性課程；而商科只有三年，課程分散在經濟學、商學、法學等數個方面，很難專精。⁸⁰⁾ 因此，這種製度的限制使在韓差會高校不能像在華差會高校那樣較全面地實現專業教育。

盡管如此，在韓差會高校與在華差會高校一樣，也接受了社會福音論和杜威教育理論，強調教育聯係韓人的社會生活。任延禧文科科長的皮時阿(J. E. Fisher)便提出：“在韓差會教育的宗旨對於傳教士而言，是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與韓人一同工作，以使他們自己和韓國人更好地理解生命，更好地掌握使生活更爲充實和富足的力量。”⁸¹⁾ 因此，差會高校在日式剛性課程結構之外，盡可能地發展貼近韓人生活的教學與科研。例如在世富蘭德醫學院，1914年成立研究科，組織學生調查韓國傳統醫藥，并在社會上從事了飲食習慣、公共衛生和傳染病等問題的調查研究。⁸²⁾ 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魯茲(D. N. Lutz)1921年加入崇實學堂後，爲農民開辦農藝班，不僅增加農民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學生以務農爲恥的傳統觀念，“許多學生看到如此輝煌的開端，如今對農業科學表現了較大的興趣。”⁸³⁾ 他自辦一個奶牛場和一個罐頭加工廠，作爲學生的實踐場所，并出版了一份《農民雜誌(Farmers Magazine)》。到1934年，崇實畢業了首屆31名農科學生，其《農民雜誌》1935年的銷量達到一萬份之多。⁸⁴⁾

傳教士也同樣提倡社會服務，并且基督教青年會也是這方面的主要機構，“尋求領導這個國家的青年充分享受生命，通過一種基於耶穌基督的生活和教導的有組織的人格發展項目，引導青年在宗教、體格、智識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正當發育”。⁸⁵⁾ 學生們在青年會組織下，在到鄉村教會去宣教的同時傳播文化知識。例如一份延禧的報告

80) 延世創立80周年紀念事業委員會，《延世大學校史》，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69年版，pp.337-341。

81) J. E. Fisher, op. cit., p.53.

82) A. I. Ludlow,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oul, KMF, May 1930.

83) D. N. Lutz, *Agriculture in Mission Work*, The Korea Missions Year Book, 1928, Seoul, pp. 137-139.

84) H. A. Rhodes and A. Campbell, *History of the Korea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Vol. II, 1935-1959, New York: Commission on Ecumenical Mission and Relations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964, pp.276-277.

85) F. T. Shipp,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KMF, Nov. 1925.

說，學生們兩個一組地來到鄉村教會，在那裏他們成了現代文明的使者，除福音布道外，還教韓語、算術、地理、唱歌和講故事，甚至被要求講女子家政、衛生和嬰兒喂養。這種社會服務不僅對他們所去的地方有好處，也令學生們的思想得到昇華，“所有的人都對巨大的需要有了新的認識，在意識到從事了某種小小的服務後感受到一種新快樂，並對將來為上帝和他們的民衆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有了新決心。”⁸⁶⁾

和在華差會高校一樣，這種聯係社會生活的教育也是為了建構一個適應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基督教知識精英群體。但不同的是，在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這種建構在有意或無意間有着獨立於日占當局控制的效應。例如，在同為青年組織的基督教青年會，中國的領袖餘日章、顧子仁等具有鮮明的主張中外和諧的國際主義觀念；而韓國的領袖則是尹致昊、李商在等具有民族獨立意識的人物。尤其如李商在(1850-1927)，是韓國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在日本吞併韓國後出任漢城基督教青年會的聖經教師，並成為韓國青年會的精神領袖。⁸⁷⁾ 於是，如果說中國青年會的“公民教育”是要培養一種“國際主義精神”，那麼韓國青年會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在韓國青年中孕育民族獨立精神的策源地。傳教士的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基督徒群體對當局的獨立性。例如魯茲辦農藝講習班，是因為官方所辦的農藝推廣活動使一批日化的農民受益後，基督徒農民向差會提出傳授農藝知識的要求。農藝班的成功，不僅使農民增加收入，也使他們更願意向教會奉獻，從而強化了教會。⁸⁸⁾ 而當1930年代在韓差會和在華差會一樣提倡教育與鄉村改造相結合時，這一運動也被突出了培養韓人獨立品格的意義。例如皮時阿強調：“韓國青年最需要的品格是獨立。它所意味的不是思想意識的形態或狀態，而是在個人品質中體現出來的實際的獨立性。它只有在人們能夠控制環境，從而不斷創造出滿足幸福生活所需的物質時才會有。一個人主動地行動，知道他在做什麼，並願意也能夠承擔其行為的全部責任，這才是一個獨立的人。所有真正的教育的目標就是要造就這樣的人。”⁸⁹⁾ 儘管這種觀念是杜威式的自由民主觀念，但在韓國的語境下，却成為日本對韓人奴化教育的一種對立面。

因此，差會高等教育在韓國也是造就了一種現代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例如，

86) R. C. Coen, *Two by Two*, KMF, Feb. 1935.

87) F. M. Brockman, *Koreas First Y. M. C. A. Student Conference*, KMF, Oct. 1910.

88) D. N. Lutz, op. cit., pp.137-138.

89) J. E. Fisher, *The Challenge of Rural Korea to the Educator*, KMF, Aug. 1931.

1922年對世富蘭德113名畢業生統計顯示僅3人任政府職務；What Are the Graduates of the Severance Medical College Doing, KMF, Jul. 1922. 1924年對延禧的畢業生57人統計顯示無人任政府職務；H. A. Rhodes, Religious Conditions in the Chosen Christian College, Seoul, Korea, KMF, Jan. 1924. 而崇實1934年統計共畢業315人，僅7人在政府供職。⁹⁰⁾ 由此可見，這個知識精英群體與官辦高校所產出的仰仗官府的日化知識群體不同，是主要在韓國民間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社會的自由職業者群體。

三. 差會高等教育在中韓的“雙重文化”形態

作為將歐美基督教文化植入東方社會的載體，差會高等教育在中韓都體現了一種東西方文化并存的“雙重文化”形態。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與整合因此成為中韓差會高校在現代知識精英群體建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尤其表現在學校的英語教學和宗教教育問題上。

在中國，作為基督教宣教事業的一部分，差會高校興起後，即便不限定只招收基督徒，也都規定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聖經等宗教課，並且必須參加學校的禮拜等宗教活動，以此將歐美的基督教信仰注入這個新的東方知識精英群體。差會高校憑借歐美列強的在華特權來保證這種“基督教品質”不受中國政府幹預，正如卜舛濟在1909年強調的：“我們可以讓政府對這些學校施以積極控制的時代還遠未到來。我們可以修正課程設置，我們可以接受監督，我們可以派學生去應考，但我們不能做任何有礙於我們事業的基督教鮮明特征的事，或幹涉我們的基督教目標的事。”⁹¹⁾

然而在語言文字問題上，最早開辦差會高等教育的傳教士大多主張不教英語。其原因一方面是怕學生學了英語後進入商界，不為教會做事，另一方面正如狄考文指出：

90) H. A. Rhodes and A. Campbell, op. cit., p.277.

91) F. L. Howks Pott, *The Present Status of Missionary Schools*, ER, May 1909.

“一個有教養的人生在那些熟知并經常引用經書的人當中，他對無知會招致蔑視，而熟知經典則會受人尊敬。”⁹²⁾ 他們希望學生能以熟悉儒學經典來使中國社會承認其知識精英的身份。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着中國學界對西學從排拒轉向吸納，經濟結構的變遷也使懂英語的人能夠在新興行業中獲得較高收入，傳教士們便不必顧慮與中國傳統文化妥協，并意識到“英語會為我們造就一個有勢力的平信徒群體”，⁹³⁾ 因而開始在差會學校裏不但教英語，還進而用英語施教。卜舫濟是這方面最積極的鼓吹者。他在列舉英語施教的避免翻譯困難、有利於接觸世界、跟上時代發展等好處後指出，差會教育中英語應當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不只是配料，不只是為教它有訓練心智的價值，也不是因為它有助於學生謀生。它應當具有某種希臘文和拉丁文過去在英格蘭的地位。它應當是打開西方寶庫之門的鑰匙。”⁹⁴⁾

雖然也有傳教士意識到語言對於知識群體的民族性的影響，“一種本國語的教育是愛國主義的基礎之一”，⁹⁵⁾ 但既然大多數傳教士不主張培育中國的民族意識，而是希望中國融入基督教的世界，進入20世紀後差會高校便普遍採用了英語施教，使之成為差會高校的主要標志之一，學生英語水平也成為衡量學校辦學水平高下的尺度。

這種英語水平的提高是與國文水平的下降成正比的。對此，差會高校有意或無意地持放任態度，聖約翰大學甚至在1917年撤消了國文部，把國文作為選修課，并允許用法文或德文來代替國文。⁹⁶⁾ 卜舫濟宣稱：“普通的學生不得不作出選擇，決定他是想成為一個中國學者，還是成為一個按我們的觀點來說的有教養的人。他自然選擇後者。”⁹⁷⁾

92) C. W. Mateer,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Study for a Mission School in China*,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6, p.50.

93) I. T. Headland, *With Our Present Experience Does It Pay to Use Mission Funds for Tea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6, p.60.

94) F. L. Hawks Pot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6, pp.63-64.

95) A. Lloyd, *English or Chinese?* CR, Jun. 1906.

96) M.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UBCCC, 1955, p.88.

97) F. L. Hawks Pott, *Remark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Mission Schools and Colleges*, ER, Oct. 1917.

差會高校於是在中國人眼中是建構一種信洋教、說洋話的特殊知識群體，隨着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現代民族意識的興起，這種局面日益受到中國學界的非議。例如中國教育總長範源濂批評差會學校蔑視中國文史知識，指出：“既然你們教出來的人連自己國家裏最重要的事情也不知道，那麼你們辦的學校顯然不能適應當前的社會環境。”⁹⁸⁾ 差會學校的強制性宗教灌輸更被視為違背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自由原則，中國教育界泰斗蔡元培指責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⁹⁹⁾ 傳教士們也開始意識到一種文化失衡的危機，1922年的基督教教育考察團報告認為“差會學校必須盡快拋棄它們的洋特征”，提出：“差會學校若要吸引學生或爭取中國人的經濟支持，必須盡快地既中國化又徹底地基督教化。”¹⁰⁰⁾

中國學界的批判到1924年演變為一場收回教育權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指責差會教育是西方對華的文化侵略，“養成奴隸人才”，剝奪中國的教育主權。¹⁰¹⁾ 隨着以北伐為高潮的大革命的興起，差會學校更成為革命浪潮的沖擊對象。這使得差會高校不得不進行體製的改革，除調整中英文教學比重，提高國文的教學質量外，更重要的是放棄在西方特權下的獨立地位，向中國政府立案，并按政府的規定，不強製學生做禮拜和將宗教課改為選修課。¹⁰²⁾

但是，這種改革其實是在中西“雙重文化”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差會高校外籍師資的高比率資源，使它們仍突出其英語教學的特色。例如燕京大學教授劉廷芳在1926年的差會教育改革會議上指出：“我們希望差會學校和大學多教國文，但不是以英文為代價。我們必須記住，雖然差會學校今日在中國被攻擊為太洋化，但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實際理由就是我們的英文教得好。”因

98) Fan, *Speech Given Before the Chihli-Shansi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ER, Apr. 1921.

99) 蔡元培, 《教育獨立議》, 《新青年》, 第4卷, 第3期, 1922年3月。

100)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 p.13.

101) 陳獨秀, 《投降條件下之中國教育權》, 《向導》, 第63期, 1924年4月30日。

102) 《中國政府關於教會學校注冊立案的布告、訓令》, 《中國近代學製史料》, 第4輯, pp.782-787.

此，“不要少教英文，而要多教國文”。¹⁰³⁾ 這就是說，這種中英雙語教育必須是有最大實效的中西融合。

更重要的是重新界定差會高校“基督教品質”的概念。傳教士們就此取得的共識是，這些學校的目的是“發展基督化的品格”，“是在培養學生，授以相當知識，使他們將來對於個人和社會，均有所貢獻，而尤在使他們的生活，都有基督化的精神；這種精神即是基督教教育本身的主動力。”¹⁰⁴⁾ 因此，早先的“宗教教育”轉變為符合基督教準則的“人格教育”。¹⁰⁵⁾ 它盡可能地與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三民主義教育”相調和，在“訓練良好公民”上取得某種一致性。¹⁰⁶⁾ 同時在宗教方面，更為強調宗教教育聯係社會生活，加強基督徒教師與學生的接觸。為此，差會高校最普遍的方法是建立小型基督徒團契，由基督徒教師領導，和學生定期聚會活動、談心交流。¹⁰⁷⁾

於是，差會高校在貫徹基督教宗教目標上，從硬性的強製灌輸架構轉變為軟性的積極影響架構，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消弭了中國人對洋教的惡感。由於近代中國人需要向歐美學習現代科技和文化，差會高校所建構的較“西化”的知識精英群體便成爲一種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梁，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多元文化發展中獨具一格。

在韓國，差會高等教育興起時在宗教教育上也採取和在華差會高校一樣的強製灌輸方式，但是，在語言文字問題上，傳教士發現韓國自己雖然有一種“諺文”，但無論官方還是文人都用漢文，傳統的教育都通過中國的經典來進行。¹⁰⁸⁾ 於是，提倡在諺文基礎上形成的韓文，成爲傳教士否定傳統儒學的權威，并使基督教宣傳更爲貼近民衆的手段。魚不信開辦世富蘭德醫學院前後，化很大力氣把歐美的醫學教材譯成韓文；Kim Kiu Sik, Dr. Kim Pil Soon, KMF, Jan. 1911. 裴緯良在崇實學堂也堅持用韓文教學。¹⁰⁹⁾ 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的韓文運動中，不少領袖與差會教

103) E. H. Hume, *Reorga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CEA Bulletin, No.16, 1926.

104) 《教會學始末特性》，《教育季刊》，1927年，第3卷，第2期。

105) 繆秋笙，《對於宗教教育的我見》，《教育季刊》，1927年，第3卷，第2期。

106) *Record of the College Conference*, ER, Oct. 1930.

107)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Group to the Conference on Religious Education*, ER, Apr. 1931.

108) *The Korean Language*, KMF, Jun. 1908.

109) Annie L. A. Baird,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Korea*, KMF, Apr. 1912.

育頗有淵源，例如周時經曾就學於培材學堂，崔光玉畢業於崇實學堂。¹¹⁰⁾

但是，當日本吞并韓國後，差會高校的這種文化形態却被視為異端。由於差會學校在日本吞并韓國後不再享有治外法權，日占當局便通過立法來對其加以限制。1915年，日占當局頒布教育法令，規定所有學校必須用日語教學，並且規定差會學校不得將宗教課程列為必修課和要求學生必須參加禮拜。於是，傳教士們就是否遵從這些規定向當局立案的問題上展開爭論。崇實學堂堅持不向當局立案，以維護學校的基督教特征；而新成立的延禧學院則決定向當局立案，後者在學院裏開設宗教選修課并實行自願的禮拜。¹¹¹⁾

日占當局對差會學校的規定雖然與後來中國政府所作的規定一樣，但其背後意義却不相同。中國政府方面是以一種民族情緒為背景，而日占當局却是要貫徹它的殖民政策。於是，後者的做法使歐美傳教士與之的對立公開化，也使傳教士們將其西方觀念的輸入與培養韓國的民族獨立意識結合起來。針對日占當局的奴化教育，他們提出“讓我們以給韓國青年以生活為座右銘”，認為“政府的學校對於它們的學生沒有施加好的道德影響。這種真正的道德氛圍必須由某種基督教組織，如教會、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會社或差會學校來帶給這些生活的追求者。”¹¹²⁾

因此在1919年的“三一”民族獨立運動中，基督徒成為中堅力量，這不是偶然的。¹¹³⁾ 差會高校的學生也積極投入愛國運動并遭到當局的殘酷迫害，引起傳教士們深深的同情。後者公開譴責當局的野蠻行徑，呼吁：“美國人應當對在這塊土地上的進步和反軍國主義運動給予最大可能的道德支持。”¹¹⁴⁾

“三一”運動也使傳教士在與當局交涉時具有某種道德優勢。借助運動的餘威，韓國新教差會聯合會於1920年向當局提出，要求允許在差會學校的課程設置中包括聖經課和禮拜，取消對使用韓語的限制，并給予學校在管理上的更大

110) L. G. Paik, *What is Han Keul?* KMF, Oct. 1935; 金昌杰, 《崇實人物志》, 漢城: 崇實中高等學校1989年版, pp. 258.

111) H. A. Rhodes, *A Bible Course for the Chosen Christian College*, KMF, Sept. 1919.

112) F. E. C. Williams, *The Educational Awakening in Korea,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 Korea and Formosa*, 1921, p. 402.

113) 基督教人韓監理會教育局, 《韓國監理教會史》, 漢城: 基督教人韓監理會教育局1975年版, pp. 227-229.

114) *Editorial: Justice for Korea*, CR, Oct. 1919.

自由和師生的思想自由。115)而日占當局不得不作出妥協，在1922年的教育法令中允許用韓語教學，並同意差會學校可以將宗教課列為必修課和規定學生參加禮拜。差會高校於是紛紛向當局立案，早先向當局立案的延禧專門學校則向當局申請改動校章並得到批准，把宗教課列為必修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禮拜。116) 這些學校立案後畢業生可享有和官辦學校一樣的資格，例如世富蘭德醫學院自1923年起獲得了畢業生免試獲得行醫資格執照的權利。117)

在語言文字問題上，差會高校此時却日益轉向英語教學。梨花學堂所開辦的學院教育是用英語施教的，因此它的文科實際上是英文專業。延禧學院最初因向當局立案，必須服從當局對日語的規定，但也在1921年的課程改革中，減少日語課，增加英語的課時。118) 1922年，校長魚不信以懂韓語的歐美籍師資難覓為由，宣布世富蘭德醫學院以後將用英語施教。119) 傳教士也像其在華同行一樣，宣揚以英韓雙語教育來建構一個知識精英群體，宣稱：“學一種語言對一個孩子或青年學生是件小事。一旦學會了英語，就為生命的其餘部分打開了世界文化之門。”120)

於是，作為傳教士與日占當局妥協的產物，在韓差會高校形成了相當於在華差會高校原生形態的韓西“雙重文化”形態。這種妥協也使本來就對民族主義深懷戒心的傳教士們與韓國民族獨立運動保持距離。例如皮時阿寫道：“基督教是一種愛的宗教，而民主的教育基於說理和人類正義；因此，在傳教的整個領域，沒有密謀、憎恨、暴力和壓製的地盤。鼓勵韓人憎恨日本人將違反基督教的原則，其‘罪’便如同鼓勵韓人憎恨韓人或美國人。”121) 差會高校也更突出其宗教目的。與在華差會高校學生較強的世俗化傾向不同，在韓差會高校學生更多地表現出虔信氣質。例如有報道說，1932年崇貴的22名畢業生中，有10人希望進神學院學習，準備將來做牧師。122)

115) R. O. Reiner, *Surve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 Korea and Formosa*, 1920, p.256.

116) H. H. Underwood, *Modern Education in Korea*, p.139.

117) O. R. Avison, *Recognition of the 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s Examinations by the Governor-General*, KMF, May 1923.

118) E. W. Koons, *Educational Work of Seoul Station*, KMF, Aug. 1921.

119) O. R. Avison, *Rel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o Medical Teachers*, KMF, Jul. 1922.

120) G. H. McGary,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in Korea*, KMF, Aug. 1916.

121) J. E. Fisher, *Democracy and Mission Education in Korea*, pp.100-101.

122) *Station Brevities*, KMF, Jun. 1932.

但是，既然差會高校推行韓西的“雙重文化”，它便客觀上有一種抵禦當局推行“日化”的效應。例如，魚丕信在宣布世富蘭德實行英語施教時便表示，雖然也可用日語施教，但“這不符合我們的最終目標使我們的畢業生接觸英語醫學論著。”¹²³⁾ 而學生則通過對語言文字的選擇來宣泄民族情感。例如在梨花學堂，學生們作為愛國表現，對學日語表示蔑視，而對學英語非常積極。¹²⁴⁾ 另外，差會高校如延禧等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韓語研究的傳統，繼續在推進韓語科學化上下功夫。¹²⁵⁾

因此，與在華差會高校提倡“中國化”，努力將所建構的較“西化”的知識精英群體融入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整體和中國社會之中不同，在韓差會高等教育所建構的“雙重文化”的知識精英群體既在文化尤其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更“西化”的特征，又在與當局“日化”政策的對立中，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一種民族獨立意識。

日占當局自然不能長期容忍這種局面。1935年，當局再次規定所有中學只準用日語授課。¹²⁶⁾ 1936年，作為侵華戰爭前的“精神動員”，當局又規定所有學校的師生必須參拜供奉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廟，並將拒不執行的崇實校長尹山溫(G. S. McCune)勒令停職。¹²⁷⁾ 傳教士們於是只得退出在韓的辦學活動，¹²⁸⁾ 而在華差會高校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則堅持了抗的立場。於是，中韓差會高校所建構的“文化”知識精英群體都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23) O. R. Avison, *Rel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o Medical Teachers*, KMF, Jul. 1922.

124) 《梨花七十年史》，pp.80-81。

125) L. G. Paik, *What is Han Keul?* KMF, Oct. 1935.

126) *Whats Interesting the Korean Church*, KMF, Jan. 1936.

127) *Whats Interesting the Korean Church*, KMF, Apr. 1936.

128) H. A. Rhodes and A. Campbell, op. cit., p.10.